



THE MAKING

OF 腹地的构建 /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 (1853—1937)

A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美] 彭慕兰 著 (Kenneth Pomeranz)

马俊亚 译

HINTERLAND

文  
景

# 腹地的构建

——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

[美]彭慕兰 著

KENNETH POMERANZ

马俊亚 译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美] 彭慕兰 著 马俊亚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陈琳

封面设计：宋涛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3.75 字数：299,000 插页：2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80元

ISBN: 978-7-208-14473-6/K·26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  
1937 / (美) 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著；马俊亚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  
1937

ISBN 978-7-208-14473-6

I. ①腹… II. ①彭… ②马… III. ①华北地区—地  
方史—研究—1853—1937 IV. ①K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7467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 目 录

译者序 1

中文版序言 33

鸣 谢 40

导 言 43

区 域 47

时 段 56

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 57

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 62

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 65

第一章 地方利率的故事：

    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区域模式 72

    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 77

    地方经济差异的持久性 83

    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边界 84

区域性的货币市场 87

经济地理中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 93

经济地理中的政治：超地方的权威和政治自卫 96

经济地理中的政治：私人收益 100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配：强大的势力 102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配：普通百姓 107

割裂的市场和区域经济形式 110

结语：割裂的市场与国家构建 118

## 第二章 社区、强制和棉花：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 123

新的农作物品种 127

拾荒与生存 139

看青活动与“棉业公会” 146

区域变化与当地领袖 162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 179

## 第三章 生态危机和“自强”逻辑 185

市场、国家和生态 185

封闭、燃料短缺和伐木砍樵 189

燃料短缺与“自强”逻辑 206

当地的努力：植树造林及其不满 212

生态、交通和边缘化 217

#### 第四章 任其自便? 229

中央政府的退出 230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优先、新的紧缩与错失的机会 242

轻视的加剧：地方瘫痪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248

秸秆与石头：落后技术的循环 261

黄运的黄河治理 279

水患的重新分布 288

#### 第五章 灾害应对 300

水利失修的经济成本 301

士绅与外国人 312

国家的分裂与水利治理：军阀时代 329

官府、乡村豪绅与地方反抗 332

工程师与士兵 352

#### 结 论 黄运、中国与世界 367

#### 附 录 387

一、鲁西北和鲁西南各县名录 387

二、水利衰退造成的农业损失 388

三、黄运水利失修所导致的额外交通成本 395

人名译名对照表 399

参考文献 401

译后记 426

## 译者序

本书系由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199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sup>1</sup>次年获费正清史学研究奖。作为译者，本人现对该书作一简介。

作者把大运河与黄河交汇附近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的部分地区作为解剖对象（书中称之为“黄运”），运用中美多家档案馆、图书馆的许多第一手资料，探索了自晚清以来国家政策的转型与国家对不同地区服务的重新配置，及其给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课和来自底层的反抗，进而对中国现代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评价。这是运用“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和

---

1 Kenneth 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来分析中国国家服务等问题的典范之作。

如同嗣后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sup>1</sup>对19世纪以前欧洲中心论的反驳一样，彭慕兰在本书中对那些似已视为“真理”的质疑和颠覆往往令人震撼。

多年来，重商主义思想似乎主导着中国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与学术评价。凡是与外国产业具有竞争性、能够抑制外国资本的扩张、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产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机器工业），均被视为“新式”“进步”或“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国家或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标志；从事这些行业的群体，也被视为新兴阶级或阶层。而经营传统产业的群体（如土地所有者、钱庄主、典当主等），则被视为“封建”“落后”的阶级或阶层。只要“新式”产业得到发展，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包括环境破坏、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社会福利的下降、基层礼义道德的覆灭等等）也似乎在所不惜。实际上，这种政策和观念不免偏颇，并具有相当的危害性。直到近来我们才明白：新式产业对所有地区

---

1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译本名为《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译者认为，《大分流》一书体现了作者对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某些非主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作者在“引言”中强调只能把中国与整个欧洲进行对比，认为18世纪以前西欧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制度两方面都没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些论点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托尼的著作中就可见到。托尼写道，研究中国，应该把中国和整个欧洲作比较，而不应把中国和某一个欧洲国家进行对比；以往视为中国经济生活独特标志的传统，实际上不是中国特有的征状，而是欧洲和中国在一个文明阶段所共有的；快速的经济变化、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西方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近四个世纪的事；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西方与中国一样，农民和纺织工人等手工业者并没有什么改变（详见 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2, Chapter 1）。相比而言，《腹地的构建》则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原创性”。

并不都是福音。自晚清中央政府采信“商战”思想以来，在一百多年间很少有人对自强逻辑本身的偏颇进行反思，更不用说去研究这个逻辑在近一个半世纪里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深重负面影响了。

作者指出，由于采信自强逻辑，政府重视的是那些有助于维护其政治独立、贸易顺差及通货储备（并且通常有助于政府部门维持其权力）的产业，而不是那些在经济方面最大程度地改善百姓生活、造福芸芸众生的项目，其特征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国家的（有时是省政府的）贸易顺差。在列强的炮口之下被强加了巨大债务的中国（并且这些债务又频繁地被用来进一步践踏中国的主权），其经济上的自强被定义为提高贸易顺差并不令人费解。令人费解的是，这种逻辑即使经历了朝代更替和社会制度的多次变革，也丝毫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和根本的改变。

国家转向自强逻辑后，国事的焦点在于维持对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现代化建设及从总体上减少威胁国家主权的债务。到20世纪，由于亏空进一步增大，国家的注意力更集中于“发达”地区，而非“落伍”地区。这种转向实际上是国家对其服务进行重新配置，在被视为核心的沿海地区，国家改善并增加了诸如治理水灾、维持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服务，但在被视为边缘的腹地，则减少了服务。

从书中可以推导出，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都不是因为“自强”方面做得不好，也不是“国家结构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的危机”或“制度不足”及“政策安排缺

位”，<sup>1</sup>而是在于忽略了传统的使命。陈翰笙先生早就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的侵入，尤其是最近金融资本的侵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sup>2</sup>饶济凡（Gilbert Rozman）等学者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中国，生产和交换方式中带有许多的现代因素。

最近的研究表明，清季和国民政府时期一般现代产业的发展非常之快，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成功地推动了农业和工业中协同增效的变革（如推广棉花、改良蚕种等）。<sup>3</sup>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家在关税、税课、货币、财政等方面的改革也相当成功。译者认为，抗战前的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具有规模效应的资本集团，这些资本集团完全具有与外资相竞争的能力。<sup>4</sup>政府的主要失败恰恰在于其忽略了以往“封建王朝”一向视为应尽义务的传统使命（主要为治水、救荒、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惩治官员腐败、构建基层社会道德等）。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机制在社会管理、维持农业经济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极大的效益。<sup>5</sup>而以“自强”为

---

1 关于国家结构不能适应危机的观点，见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4, 299, 300-306。近代中国制度不足的论述，见刘佛丁：《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第25页。政策安排缺位的论点，见王玉茹：《中国近代政府行为特征及其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第38—40页。

2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3 Gilbert Rozman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 pp. 107-108.

4 详见马俊亚：《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济现代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详见 Pierre-Etienne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目标的政策在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抛弃了中国传统官僚机制的合理方面，这种政策对本来就已贫困的地区和游离于货币经济以外及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以外的那些事务打击最重，这种负面作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虽不大，但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影响极大。如彭慕兰所说，政府的合法性在普通人中所受的损害，远远超过了政府在“自强”中所获得的有限成功。农民从来不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没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及对乡村的控制是好事。GDP崇拜综合征的后果，今天正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以往的学者无不强调中国加入“发达”世界的努力及市场一体化的正面影响，但大多数农民却希望政府能继续提供防治自然灾害、治理河道、赈恤贫穷、清剿土匪、惩治腐败等传统服务。但被重商主义思潮所左右的政府，把各种资源和服务集中到了沿海地区，对不能为其增加工商税收的“腹地”放任不管，甚至不承担应尽的使命，使得腹地的社会生态急剧衰败，结果，正是这些在新国策中被政府视为无足轻重的区域，农民群起抛弃了政府，许多人最终转向了革命。

可见，这部著作不仅有助于弥补以往学术上的偏差，甚至有助于解释 20 世纪中期中国所选择的新方向。<sup>1</sup>

作者的创见贯穿于全书的每一章节。20 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

---

1 译者认为，彭慕兰从国家政策转型的角度解释由于国家“抛弃”了腹地，而造成该地区农民对清朝和国民政府离心离德的说法，比杜赞奇等学者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杜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西达·斯考切波认为“国家政权的衰弱是发生革命的前提条件”；查默斯·约翰逊则认为日本的入侵使得共产党能够利用民族情绪来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以上观点见 [美]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83 页。

认为，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摧毁了中国的农村手工业，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伦敦纽约的农产价格，由无线电收音机当天就影响到最偏僻农村的原料作物的价格了；列强变为世界上的都市，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上的农村。”<sup>1</sup>后来持“现代化”和“依附”论的学者多认为帝国主义最恶劣的政治遗产，是使20世纪的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沦为一个落后而无法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国家。对此，伊懋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正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性贡献缓解并打破了中国的高度均衡陷阱。19世纪中期这个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开放，很快导致了主要的对外开放地区（特别是上海）商业和工业的快速增长”，<sup>2</sup>这个论点得到了不少西方学者的赞同。<sup>3</sup>

作者把重点放在黄运本就存在的社会结构与国家旧使命的失败上，以此来理解“依附”与“世界体系”中的分歧，他采用了这两种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见解：不同于非此即彼地认为某些国家（或地区）已经“现代化了”，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则没有；他认为富裕和贫困地区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会造成其他地区的停滞或恶化。另外，作者基本上不赞成伊懋可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外国人在黄运帮助推广美棉，为黄运做出了不少有益的事，但中国与西方的碰撞，从根本上对黄运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为了解释这一点，作者超越了罗斯基等一些纯经济研究所得出

---

1 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

2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15.

3 参见 Dwight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6-47。

的结论，<sup>1</sup>如不仅仅纠缠于黄运从市场整合中所获得的外部商品或黄运为战争、赔款和编练新军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中国“中央政府”政策的转型作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经济影响的模型孤立开来。正是帝国主义的威胁造成了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性改变，而这种改变的直接后果就是“贫穷的”腹地被国家所抛弃，并变得更加贫穷。<sup>2</sup>

就本书强调帝国主义对内地的影响而言，彭氏赞成沃勒斯坦等人的“依附”和“世界体系”论，用一种情况下出现了“现代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没有出现“现代化”来取代传统观点的“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人们理应探讨这些结果成为一种单一过程组成部分的途径：从政治角度来观察一个大国内部的现代化和内卷化甚至是退化。更可贵的是，作者的论点还有较大的创新，他所强调的不是关于黄运融合到世界体系中的负面影响。就黄运所发生的一切来说，它没有融入新网络却又造成了旧网络的崩溃，这比融入新网络或留在旧网络中的危害都要大。黄运与现代经济的关系也并不全是“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把边缘与其核心联系起来的树枝状类型。

作者在研究中还发现，华北地区确实带有杜赞奇所说的“国家内卷化”的许多特征：现代国家的财政支出膨胀，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sup>3</sup>但是，一旦作者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

---

1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 Immanuel Wallerstein, *Modern World-System*, 2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译者所述的沃勒斯坦观点主要来自 Angus McDonald, "Wallerstein's World Economy: How Seriously Should We Take i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 (May 1979), pp. 535-540.

3 Prasenjit Duara, "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193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 (Jan. 1987), pp. 132-161. 亦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80页。

来观察以及观察国家是如何解决新旧使命之间、核心与腹地之间的显著差异时，杜赞奇的模型就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正。杜赞奇从低水平的、政府雇用的“企业经纪人”这样一种新阶级和政府能力衰退的角度，来阐述所有遍及华北的更大的榨取。作者认为，这可能是介于两种鲜明发展图式之间的常规画面。一方面，更多的榨取事实上已经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务产生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越来越为国家所忽视，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腹地既承受政权内卷化之苦，又承受着国家政策转型之苦。

从彭慕兰所述的自强逻辑的角度，还可以解释许多含糊不清的“文化”问题。如以往在解释中国人较少消费西方商品时，经常归结于两个典型的中国文化特性：（1）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商品的排斥，降低了中国人消费西方商品的兴趣；（2）中国人坚信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不喜欢所有的外国人及外国商品。<sup>1</sup>从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被边缘化了的腹地，失去了与沿海经济相融合的政策扶持，并遭到人为的封锁，也就无法得到和消费沿海地区质优价廉的商品（主要是西方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二百多年以前，西方学者就注意到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有人写道：“世界上最富庶的和最繁荣的帝国同时在某一意义上也是最穷困的和最悲惨的。”<sup>2</sup>但学者多习惯于从人口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孟德斯鸠在18世纪中期指出：“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中国

---

1 详见〔美〕汉密尔顿：《中国社会与经济》，张维安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03页。

2 〔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子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24页。

和所有其他产米的国家一样，常常会发生饥荒。”<sup>1</sup> 休谟还论述与中国人口增长的弃婴问题。<sup>2</sup> 最早对中国人口与贫困关系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是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土地不堪重负。<sup>3</sup> 当代学者更常常把人口因素作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基石。<sup>4</sup> 彭慕兰从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家治国思想与宏观战略大转变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从而凸显了新经济政策给黄运造成的压力和贫困。而学者历来所关注的人口压力，与国家政策转型及服务减少所造成的压力相比，在黄运社会经济衰退中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后者来得突兀和直接。在传统的国策中，中央政府从江南等富裕地区榨取财富，用以维持自然生态较为脆弱的华北、西北等地区的生态循环。但自 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加快了其国家构建，以不懈的努力来建设富裕、具有竞争力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创造了现代类型的国家和经济。但国家政策的改变，使“腹地”再也无法从江南等地得到必需的资源用以维持基本的生态循环，国家在这些地区所提供的服务也日渐

---

1 [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28 页。

2 [英] 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10 页。

3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 123—125 页。

4 代表性的著作是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在这部著作中，何多次明确表示赞成马尔萨斯的观点（如第 226、256 页），还把清代的人口学家洪亮吉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第 271 页）。他认为：“康熙和雍正时代的宽政——人口增长的刺激因素之一——种下了清朝衰败的种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经济障碍”（第 275 页）。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华帝国末期的历史中，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见 [美]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16 页。



减少，从而使社会生态每况愈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许多地区承受着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而黄运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国大部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往往是其最繁华的地区，一穷二白的黄运则是一个例外。彭氏明确指出，马尔萨斯学派所说的人口压力，并不能解释19世纪中期以后的生态恶化问题，因为黄运的人口在19世纪40年代至1949年这一百多年里并没有大的增长。

关于对中国农民土地经营和劳动力分配的研究，彭氏总结为“单一逻辑”和“多重逻辑”论。“单一逻辑”论的持有者，如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om Rawksi）、洛伦·勃兰特（Loren Brandt）等认为尽管不同的农民拥有不同的资源，但他们全都按同样的方法（即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马若孟认为：“家庭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农业劳动和其他资源，或者通过手工业、商业和其他职业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sup>1</sup>“多重逻辑”论的支持者，如陈翰笙、景甦和罗仑、黄宗智（Philip Huang）等认为不同的阶级按照根本不同的逻辑来决定其行为。黄宗智认为，那些经营大的“经营性农场”的人是利润的最大化者，但那些更近似于谋生的农民则不是。某些人对从其小农场中获取可靠的收入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他们从事着“自我开发”，在这类劳动获得的边际收入已然极大地低于现行的报酬以后，仍把多余时间投入进来。其他人则孤注一掷地种植高风险、高利润的作物来寻求从过于狭小的地块中竭力维持生计。<sup>2</sup>彭氏跳出了现存的

---

1 [美]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5—146页。

2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62. 此处对黄宗智观点的总结为彭氏所作。